



难忘家乡的玉米香

王青发



小舅子带着他的北京媳妇回乡度假，来到我家下楼转了一会儿，买回来一捧爆米花，叫我和妻子品尝。我一尝，是玉米爆的，甜甜的、酥酥的、脆脆的。这让我想起了家乡的玉米香。

陕北人说“男孩子不吃十年闲饭”。小时候，四月中旬，跟着父母去种玉米。父亲耕地，我撒种，母亲施肥，我的活最轻。我在父母的指导下，一小步远撒两颗种子，两颗种子是同时撒到父亲犁出的小沟壕里的。过了一段时间后，玉米苗长出来了，并排两株，一簇一簇的。父亲这时要间苗了，要拔掉一株，留下一株。我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当初不一个位置种上一颗种子呢？”父亲解释说：“种上一颗种子，万一这颗种子坏掉，这里就不会出苗了。两株苗都留下，水肥供应不足，两株都长不好，要留下一株壮实的，拔掉一株弱小的。”我恍然大悟，从这种现象里，我便悟出了未雨绸缪、优胜劣汰的道理。

到了小学高年级时放暑假，父母会给我分配一项任务就是锄自留地的玉

米。夏季七月份，玉米长高了，玉米地变得郁郁葱葱，大地罩上了一块块厚厚的绿毯子。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沟条地里，几乎全部是这样的景象，一片片的青纱帐笼罩着大地。父母给我分配这样的活儿，也许是因为锄玉米不需要承受烈日暴晒，不用上山下坡，但锄玉米也远没有想象中舒适，钻到玉米地里锄地，如果穿上长衣长裤的话，便热得汗流浹背，好像洗桑拿澡；如果脱掉长衣，锋利的玉米叶子会在光着的膀子、小腿上，割出一道道血痕，汗水流过血痕时会钻心地疼。对此，我只好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先穿上长衣，实在热得不行了就脱掉长衣，换上短衣，身上难以避免留下一道道血痕。父母叫我锄玉米，也许是让我体验稼穡的艰辛，从而能够专心读书。因为这时候才最能体验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谛。

到了八月份，玉米棒子上的玉米粒快要成熟。我们家和好多家庭一样，粮食已经吃完，到了吃糠咽菜的时候，煮玉

米棒子成了孩子们向往的美食。但是，农业合作社的玉米是不能掰下来煮着吃的，得等到玉米成熟了以后分给每家。自留地里的玉米数量有限，所以孩子们不能敞开肚皮吃，玉米还没有煮熟，孩子们就开始喊叫着要吃了，好不容易等到出锅了，力气小的、手慢的，只能抢到一根小的玉米棒子。玉米棒子烫手，就在棒子的下端扎上一根筷子，手握在筷子上吃。一口咬下去，甜甜的、脆脆的，满口生香，直喊“好吃”。一个吃完后不尽兴，还要吃第二个，但已经没有了。父母往往是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他们是一粒也舍不得吃的。老家的沟条地里，大片大片的玉米都结着玉米棒子，玉米地并没有人照看，如果有人要偷着掰下玉米拿回去吃，也不会被发现。但自我记事以来，我们村及周围村，从未听说过偷掰玉米棒子的事情。大家宁可饿肚子，也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这也足可以看出陕北民风的淳朴。

到了九月份，糠也吃不上了，玉米粒也变硬了，不能煮着吃了，但玉米只有八九分熟，还不能磨成面粉。母亲把它在碾子上压成扁状的，然后和上水，用手捏成圆形的或者饼状的，放在蒸笼上蒸熟吃。这种食物吃起来味道比不上煮玉米棒子，也比不上玉米面粉做成的食物。这是一种不得已的吃法，这种情景会让人体味到什么青黄不接。

十月份，玉米秆上的叶子由绿变白。玉米棒子包着的叶子也开裂了，露出金灿灿的玉米粒。玉米成熟了，父母和他们的农民朋友开始收玉米，大家会把棒子外面裹着的叶子除去，地头会出现一道黄灿灿的小山梁，到傍晚时这道山梁会瞬间消失，玉米棒子分给了各家各户。父母肩挑背扛，放学回家的我也帮衬着，好一阵忙活，到掌灯时候，才把分到的玉米全部运送回家，然后母亲开始张罗晚饭，这个时候，虽然辛苦，但大家心情都很好，因为终于不用饿肚子了。

自留地里掰下的玉米棒子可以保留叶子，把两个玉米棒子带有水分的叶子系在一块，挂在院子上的树上，黄澄澄的，一串又一串，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玉米秆还留在地里，等农忙过去再砍回去当柴火烧，或者用铡刀铡成短棒做牲畜饲料用。玉米秆在干枯之前，剥去外面的一层硬皮，把里面的肉一砸吧，会砸出甜味，我小的时候，玉米秆就是陕北孩子的“甘蔗秆”。

陕北农民，一年四季是没有空闲的。冬天，农忙过去以后，玉米棒子也干了，农民开始给玉米脱粒，有的是把玉米棒子放成一堆拿木棍敲打，有的是用手借助玉米芯子把玉米粒一排一排往下推压，民间俗称“划玉米”。放学后的孩子们也会加入到这项工作中，除去玉米粒的玉米芯子，可用来烧火做饭。生活困难的家庭往往会等不到这个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把未干透的玉米粒磨成面粉，用来填饱肚子。

玉米磨成面粉后，为了让孩子们吃得好，母亲会挖空心思，把它制作成各种面食。加水揉成面团，经过发酵，拿苏打粉或碱面中和以后，把面团摊在蒸笼上蒸熟，拿线或者菜刀切割成方块状，金黄色黄的，远看像一块块金砖。吃到嘴里丝丝、软乎乎的，村民们叫它“玉米黄”。这比糠、麦麸做成的团子不知要好多少倍。农业合作社时代，顿顿能吃上玉米黄的家庭就算是好光景了。玉米面还可蒸成馍，叫玉米馍。捏成钢盔状的，中间是空的，叫玉米窝窝。也可以不经过发酵，捏成块状的，叫玉米团子，俗称“黄团长”，“黄团长”咬起来硬硬的，比玉米黄有嚼头，吃起来同样甜甜的。玉米面加上白面或糜子面，加水调和成糊状，经过发酵，在鏊子上刷上油，下面用柴火加热，把面糊浇在鏊子上，做成摊黄，简直能香死人。玉米面加上软糜子面，在蒸笼上先蒸熟，然后切成块状，油炸出来的油糕，软硬适中，不相互粘连。母亲擀面条的时候，在把面团由厚擀薄的过程中，不断撒上玉米面，做出来的面条爽口还不会粘连在一起。玉米面和白面混合蒸出的两面馍馍，既有白面的爽口、筋道，又有玉米的香甜，也不失为一道美食。玉米碾烂，去皮，可以和小米豆类放在一起熬粥喝。玉米食品样式繁多，也看出

陕北农民在贫穷的年代，粗粮精做，追求生活质量的理念和智慧。

玉米也有遭灾的时候。家乡的玉米往往种在地势低洼、排水设施不完善的坝地里，遇上大暴雨，洪水侵袭玉米地，一大片一大片玉米秆裹着泥巴趴在田地中。有时遇上天旱，五月到六月，赤日炎炎，滴雨不落，河水枯干，玉米秆就会被晒死。遇到这两种情况，父母哭丧着脸，连连叹气：“今年又瞎忙活了。”今年八月份，我坐火车从延安到西安之间往返，在富县到甘泉的路上，看见一片玉米被洪水冲倒，这不禁让我感慨万千。黄土高原的老百姓啊，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旱涝侵袭的状况啊？

小时候，给劳作的父亲送饭，看到灰头土脸的父亲吃着难以咽下的糠团子，我就想，什么时候能让父亲顿顿吃上玉米黄就好了。现在，父母老了，不用劳作，也顿顿吃的是白面、大米。儿女们打工的打工，工作的工作，都生活在城市，但二老仍然不愿离开打拼了一辈子的农村。他们仍然生活在延川的农村，虽体力不支了，但年年还种着少量的玉米。每到八月份，他们就盯着村口，盼着儿孙们回来吃煮玉米。儿孙们有事回不来，他们逮住顺风车就给城里住的儿孙们捎，直到玉米被掰尽为止。他们觉得让儿孙们吃着他们种的香喷喷的玉米才踏实。

村里的农民虽然还种玉米，或是为了做饲料，或是为了煮玉米棒子吃，或是作为擀面条、熬粥之用，或是秋后卖给食品厂。偶尔，我到超市买来了面，按照过去的做法去做玉米黄，却远远没有当年的味道了，也许我吃的是外面运来的玉米面。我常常想要是能吃上一顿当年那样香甜可口的玉米黄该多好。

是黄土高原高天厚土的滋养，父老乡亲殚精竭虑的培育，才有了家乡的玉米香。家乡的玉米香啊，承载了多少呵护与关爱，承载了多少心酸与艰辛，承载了多少期盼与希冀，承载了多少感受与顿悟。家乡的玉米香，内涵丰富、味道醇厚，让人回味无穷。

我和知青的故事

(上接第一版)

不知道他从什么渠道找到我的电话。理直气壮地要我为他的长篇小说写序。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文艺工作者，曾多次下决心不再写序文之类的文字了。可是，这是一位在陕北生活了7年的老知青，这是他呕心沥血劳作10年的劳动成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知青”这个词渐渐淡出人们的言谈。然而，我却不能。

我在延长县的知青好友张莉，和她一起来陕北插队的哥哥张大力，在为老乡送药的夜晚，被一条狗冲下山崖而亡命。还有三个女知青在高粱笼中避雨遭雷电所击而身亡。

我缅怀他们青春生命的每一个灵魂，也常常为走出黄土地去干大事、创大业的每一个知青默默祝福。

我的“知青情结”，使我不加思索地答应了对“老插”许复强的请求。

我在电话中告诉他，9月3日，我要去北京参加歌剧《白毛女》上演60周年座谈会，约他在北京一见。

他如约而至，我和许复强就他的小说，进行了较长时间交谈。一回延安，我便开始阅读许复强的长篇小说，一口气读了三遍。

我常常惊叹“知青作家”们对陕北农村生活民情习俗的娴熟。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陶正的《老汉们》《婆姨们》《后生们》《女子们》和许复强的《情感之恩》，我以为这些作品，不仅是美妙的田园交响曲，而且是镶嵌在中国当代文学长廊的“清明上河图”！

许复强的小说文字流畅，故事生动，引人入胜，唯独书名《情感之恩》缺乏张力。但是，已经签订了出版合同，不能改变。为了吸引读者，我加上了副标题：诱人的长辫子，并帮他设计了封面和“眉题”，得到他和出版社的赞许。

我给这部小说写了6000余言的序文，这部小说已经被延安知青博物馆收藏。

出版社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1973年增订再版，国内外发行了28.8万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都发表了分量很高的评价文章。

为什么？在交通不便、贫困落后的延川县会呈现出这么一种奇特文化现象？

其实，许多评论家并没有注意到它和知青运动的关联。

首先参与这部诗集的编辑就有插队知青。

延川县关庄公社鸭巷大队的北京知青陶正，离京时就带了一部油印机，在鸭巷办了一份《中国红卫兵通讯》的报纸，在全国散发。

这份报纸连中央文件也敢发表，不符合中央规定被要求查封。

县革委会指派我和另一名党员干部去执行。

我对陶正说，油印的《通讯》不能办了，请你到县上办铅印的《山花》文学报。

当时，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正创办“农村通讯员学习班”，每个学员的学期半年到一年，每月18块5毛误工补贴。陶正从青平川后沟调进城，顿时成了《山花》文学报的一员战将。

诗集《延安山花》出版前的《工农兵定弦我唱歌》，就是陶正一笔一画刻蜡版印刷而成。

这个学习班里，在他到来之前已经有了一位学员，叫路遥。

他以中篇小说《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和百万余言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震撼中国文坛。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和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这个学习班的学员，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国家级教学名师”杨士敏，北京市人民政府归侨专家咨询团成员、北京灿和兄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思泰正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解明明，还有曾任我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非洲卢旺达大使，现任中亚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舒展。

2019年9月18日，舒展带领延安大学与中国非洲研究院联合召开的“延安精神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代表，参观谷溪书馆。

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是一个副科级行政单位，在县革委会领导的支持下，不到两年时间，就推出一个如此杰出的学员群体。

延川是一块风水宝地，雄居秦晋峡谷

的“乾坤湾”就在延川，许多大家、名家的处女作在“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主办的《山花》文学报发表。

著名诗人梅绍静的叙事长诗首先在《山花》选发，然后推荐陕西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整版转载，轰动全国。

著名教育家、曾任杭州大学校长的杨卫，当年在延川县冯家坪公社寺村插队时，就在《山花》上整版发表了他的处女诗作《党啊，我把心歌献给你》。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河》杂志执行主编阎安，著名诗人、《各界》杂志主编远村，都曾在《山花》发表过他们早期的诗作。

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黄堡书学院院长和谷，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就在《山花》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访英雄》。

著名作家海波，从写秧歌词开始，成了延川县继路遥之后成就最大的本土作家。

七月派诗人侯唯动的儿子哈颖康，曾是《山花》文学报的骨干作者。

在中国政坛享有盛名的陶海粟，在知青时代，就是《山花》的骨干作者。

七

2021年，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学习与研究》第三期中，发表了我撰写的文艺随笔《陕北是个大气场》。

一百多年前，一位叫史密斯的英国传教士，在延安乃至全国做了多年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翻阅了大量中外历史文献，撰写了洋洋30万言的《官员与传教士在中国》(刘蓉译为《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他在这部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话语，令人惊叹：“不管我们有幸对延安府的未来有何贡献，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延安府的历史不会是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老。我的调查工作渐渐让我产生了一种近似敬畏的谦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越多，敬畏也与日俱增。”

事实证明，这位英国传教士的观点，成了一个伟大的预言！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7000名精疲力竭的红军战士到了陕北吴起镇，从此

陕北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新长征的出发点。

毛主席率领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小米加步枪”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踏步从延河畔走到了天安门广场。

1969年，响应毛主席号召，2.7万余名北京知识青年到延安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抚今追昔，我以为，陕北是一个大磁场、大气场！

多少年来，无数先烈在这块土地洒下了他们的汗水、泪水和鲜血。所以这块土地的每一粒黄土、每一株草，都包含着他们思想的结晶、智慧的信息。

我曾在许多场合讲过，象征中华民族的长城、黄河和黄帝陵，非常奇妙地在陕北黄土高原相聚。所以在它赤裸裸的大山中，弥漫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色彩。

不管是土著的陕北人，还是客居陕北的异乡人，只要你投入这块土地的怀抱，让自己的心灵与这块土地同步震颤，就可以接收到这块土地的能量与信息，就可以获得自己也不曾想到的巨大的成功。

在前知青时代，我结识了两位知青朋友。一位叫李华，另一位叫张小建。李华是志丹县革委会副书记，张小建是志丹双河公社向阳沟生产大队的生产队长。

那时，我是《延安通讯》的记者，在农田会战的工地拍摄了许多照片，现在看来非常亲切。

回京后，李华退出了政坛，张小建进入中央机关工作。2001年6月，张小建担任了全国劳动保障部副部长，现任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

50多年，他们和我的交往不断，李华称我“大哥”，小建称我为“老师”。“大哥”敢当，我毕竟年轻他们十多岁，“老师”可不敢当。

李华教我做“站桩”，也许由于我的懒惰，几年学不会，他教我学习“量子物理”，我一学就开窍。量子物理推翻了经典物理诸多定律，过去不理解的许多问题，豁然开朗。

李华和张小建，是我非常敬重的两位知青朋友，他们离开陕北后，心中一直牵挂着自己的第二故乡，几乎每年都要回陕北居住一段时间。

不久前，我看到延安市一名宣传干事

的新闻特写《跨越山河的一次英雄会师》。

2024年8月8日晚开始，志丹县出现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水量达到124.8毫米，最大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达到179.1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县城很多车辆被山洪冲到街道，5000余名群众被困。县委、县政府紧急动员全体干部、市民抗洪救灾，这一支抗洪救灾的队伍中，有一支身着红色队服的队伍，引起了张小建的注意。

哪里有危险，哪里有艰难，哪里就有这支队伍的身影。8月13日，经过多方周折，张小建和李华终于见到了正在抗洪抢险前线的志丹雷霆应急救援队长谢林和队员李海东。交谈中无意得知，救援队的李海东，正是他们插队的向阳沟村四队李二牛的儿子。看到他儿子如此优秀，李华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们应当欣慰，在刘志丹故乡还有这么一支英雄的救援队伍。他们没有行政编制，没有财政拨款，多年来驰骋在洛河、黄河之滨。他们舍生忘死、救死扶伤的英雄事迹，令张小建和李华忍不住一次次落泪。

感动于志丹雷霆应急救援队的无私奉献，张小建和李华给雷霆应急救援队捐了一笔赞助费以表心意。

2024年10月21日上午10点，北京知青回访团何晓新一行来到虎头园谷溪书馆。蹊跷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延安市文联主席孙文芳在北京接通了著名诗人贺敬之和我的视频电话。

孙文芳首先转达了我对贺老“百岁华诞”的衷心祝贺。贺老在视频中笑着说：“谢谢你，谷溪同志！”

贺老说：“他比我年轻得多，有没有80岁？”孙文芳说：“他84岁了，已经满头白发！”

贺老说：“谷溪的气色很好。”贺老的秘书柳涌介绍说：“他现在还一直在干活(写作)。”

北京知青回访团的何晓新等知青齐声高喊：“祝贺老先生生日快乐！”并向贺老展示了他们送我的字画：“曹谷溪 知青的贴心人。”

贺老挥动自己的手臂：“你们为延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啊！”

我和所有的知青都非常激动，他的一句话把这个电话视频活动推向高潮。

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捧定宝塔山！

视频停止了，所有知青还手舞足蹈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六

在百花凋零的早春寒月，一朵山花在黄河畔，向阳的山弯窝里悄然绽放！

1972年，我和路遥、陶正、闻频、白军民等几个文学青年一起编辑，由陕西人民